

媒体时代异化的加剧与反异化的兴起

应力浩

摘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在工业社会中出现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现象对劳动者造成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学者将异化理论与大众媒体进行了联系，并指出在大众媒体时代产生的“文化工业”对人类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异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中又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劳工的“电子劳工”。而“电子劳工”的出现又与“电子异化”的形成产生了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被迫受困于三重异化的裹挟。但是，凯尔纳从黑格尔思想中所提炼出的反异化理论又给异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新媒体中所包含的互动元素及其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具有反异化特征的行为在当今社会已经开始规模化出现。

关键词：异化；反异化；马克思；文化工业；新媒体；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应力浩，男，硕士生。（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 宁波，31510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6-0042-07

自从马克思提出他的异化理论以来，关于人类异化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哲学界研究的焦点。而异化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内容延展性也使其成为了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将异化理论与资本主义环境下大众媒体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联系起来，并用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证明了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媒体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指数性增长也让不少学者担心，媒体对人类的控制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人类异化的形式和维度也会相应地发生巨变。受到多重异化包围的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意识，这也似乎与黑格尔思想中主体精神和客体最终趋向同一的理想状态越走越远。与此同时，新媒体中包含的互动性元素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给受众的自我觉醒（反异化）提供了可能。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即是异化同反异化这一组看似矛盾的关联体之间所存在的某种辩证关系。

一、异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一般认为，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创造并发扬了异化理论。事实上，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就对异化的概念提出过思考，他指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约束和制度，使人类逐渐丧失其本性，变得越来越不自由。^[1]几年后，在《社会契约论》里，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2]卢梭已经发现了社会中所出现的某些与异化相似的特征，然而他本人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使得他不能将异化以完整的理论形式推出。不过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契约社会对人类自由的侵蚀。随着生存技能的提升以及生存压力的减小，人类从安全性和稳定性角度出发，自愿决定脱离自然状态并让渡出部分“天赋”权利予社会，使自己得以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中生存。然而处在这个文明和进步社会中的他们却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变得不能完全控制自己。

首位将异化以明确理论提出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他把在原始状态下统一的主体意识（精神）与客体（自然界）的分离过程称为异化。^[3]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对“异化”本身持有相对中立的态度，他相信异化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尽管主客体之间正在经历或已经产生分离，但随着主体自我意识的加

强（尽管他认为这一过程极其漫长且艰难），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将逐渐消除，并最终重新趋向同一。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包含了三个阶段，即主客体之间的“同一”、“异化”与“反异化”过程。费尔巴哈则批判了黑格尔具有唯灵论倾向的异化理论，他认为异化的主体应该是以实体存在的人，而黑格尔理论中所谓的绝对精神只是人异化后的产物。^[4]

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费尔巴哈宗教式的异化理论，他却认可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批判以及他将人作为异化主体的研究方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系统地描绘了在私有制条件下所发生的“异化”对作为劳动者的人类所带来的变化：（1）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2）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4）人同人相异化。^[5]简言之，劳动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对其生活和命运的控制权。通过异化理论，马克思对私有制条件下的追求资本积累的社会（马克思在此时尚未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身处于其中的劳动者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化和私有制的发展对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人类的本性遭到了破坏。一方面，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中的“异化”过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于“反异化”过程的理解却大相径庭。马克思并没有彻底否认反异化的可能性，但对他而言，反异化只可能出现在颠覆性革命后或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革后。也就是说，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在社会常态状况中由主体主观出发的反异化行为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异化理论后，并未在日后对其加以过多的补充和修正。事实上，作为马克思的早期重要理论之一的异化理论，在其中后期的作品中甚至鲜有被提及（因与主题关系不大，本文将不讨论为何马克思选择扬弃这一重要理论）。相比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思考深度和理论完整性上都略胜一筹，但是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相类似的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异化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形而上特征。

二、大众媒体与异化

马克思的后辈，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20世纪初期重拾起了异化理论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对接，并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理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泛滥的商品形式进行分析，讨论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辩证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作为行为主体进行劳动活动所产出的“劳动产品成了商品”^[6]。人的劳动所得脱离了人的控制范围，最终与其对立。而作为劳动成果产出的商品，类比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则成了人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说，劳动产品成为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呈现方式，劳动者则因此变得等同于劳动产品。根据卢卡奇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本应享有他们劳动后产出的劳动产品，即商品的支配权。而现实状况下这种支配权的缺失恰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劳动本身所发生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讨论的是人类劳动在工业化私有制条件下所发生的与其本身的分离现象，即因劳动客体化而产生的与主体的分离，而物化理论讨论的则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商品化现象，即因劳动商品化而产生的与主体的分离。因此，从根本上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本框架。物化并非是异化的变体形式或深化，它只是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就是说，物化从属于异化，而异化包含了物化。

不得不提的是，正是由于卢卡奇的积极尝试，一系列具有深刻见解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中涌现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批判理论核心思想正是综合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处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媒体进行了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创造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概念以抨击日益堕落的大众文化。^[7]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大众媒体更像是一系列的生产车间，在这些车间里生产的不是实体产品，而是大量具有标准化、普遍化和商品化特征的媒体和文化产品，诸如电影、广播节目和娱乐杂志等。而这些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明显趋同性特征的文化产品，却极大地影响了受众对文化的理解。每个人所独有的个性和特点在大众媒体时代成了幻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7]。可以说，资本主义尝试用大众媒体所制造和生产的“文化工业”对人类的思想进行控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人类的思想变得工业化、产品化以及资本主义化。而当一个人变得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他一定是被异化了的个体。本雅明则比较了机械复制时代大量涌现的与原作相似度极高的复制品同原作之间的关系，认为再高明的机械复制品也无法代替更不可能超越原作的价值和功能。原作永远是独立于复制品的，因为在机械复制过程中，艺术家在原作创作过程中以及观者在欣赏过程中所产生的“灵韵（aura）”消失了。^[8]而这种“灵韵”正是源自于艺术家的灵光一现以及观者因距离而产生的对作品的敬畏感。随着技术的发展，复制品可以在外观和形式上无限接近原作，但由于“灵韵”的缺失，复制品永远只能是缺乏精神价值的复制品。简言之，相比于原作，复制品只是行尸走肉。更重要的是，复制品的泛滥不仅使原作在实用价值上受到了折损，更使得观者失去了基本的欣赏和审美能力。马尔库塞强调了大众媒体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悲观地指出：大众媒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创造了大量对人类而言毫无意义的需求。这些无意义需求的生成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人类逐渐失去了基本的理解能力和批判能力，最终人类被改造成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9]而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通常具有思想单一化、知识匮乏化、政治冷漠化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大众媒体对人的异化产生的结果。

结合几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观点，大众媒体的兴盛造成的恶果是：个体独特性的磨灭，大众审美观的扭曲以及求知欲和思考能力的缺失。相比于马克思时代的异化，大众媒体带来的是人类在思想上的进一步异化。

三、新媒体与电子异化

卡斯特选择使用“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一词来指代在信息时代出现的范围更广、更为高效且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资本主义体系。^[10]这个体系通过不断创新信息技术而变得日益强盛，而日益强盛的资本主义体系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了信息技术的革新。富克斯由此提出了“电子劳工（digital labour）”的概念，他指出，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定义为“在互联网通讯技术支持下对资本积累有必要作用的个体”的电子劳工已经出现了。^[11]换言之，处于新媒体时代的人类，在原有的传统劳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属性。表面上，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我们投入到传统劳动的时间相比过去减少了，但事实上，我们投入劳动的时间总和可能是增加了，因为网络社会的虚拟空间也成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正常工作时间，我们在工作地点进行劳动；到了闲暇时，我们则在网络上进行劳动。安德烈杰维奇在分析我们的网络行为时指出：“我们编写的每一条信息，我们上传的每一个视频，我们购买或浏览的每一个商品，我们的时间—空间路径以及我们的社会互动模式都成了可以用来分辨、预测和管理我们行为的数据。”^[12]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在网络上进行的每一个行为，都属于电子劳动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将马克思针对传统劳工的异化理论与新媒体（社交媒体）时代所出现的电子劳工进行联系。通过和马克思的传统异化理论对比，我们可以对电子异化做出系统性的总结：与传统劳工类似的是，电子劳工受到了“电子异化”，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交流过

程，无法控制用于进行交流的工具，无法控制在传播过程中创造的信息以及无法控制交流过程的对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的“仿像（simulacrum）”理论就是本雅明的“灵韵”论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发展和延续。波德里亚的仿像理论具有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仿造（counterfeit），主要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到工业革命前。由于缺少工业化的支持，仿造追求的是对原型最大程度的手工模仿。仿像的第二等级是生产（production），出现于工业时代或者说是本雅明所提到的机械复制时代，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时代，在这一等级里，原型通过工业化被重复生产。第三等级是仿真（simulation），出现在我们所生活的数字时代，具有后现代特征。在第三等级里，无所不在的仿真品使得整个世界变得仿真化。大众媒体通过仿像创造出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也就是无数个不同于真实世界的完全由仿像构成的“新世界”。^[13]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真实与仿真变得难以辨别，甚至说，真实被大量充斥的仿真所掩盖、所取代。被仿真世界吸引的我们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我们被仿真所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波德里亚的仿像理论与新媒体进行联系，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存在于真实世界与新媒体所创造的半真实或虚拟世界之间的身份（identity）混乱现象。我们在虚拟世界创造的身份，与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是我们的存在本身是不一致且分离的，而这种由二元身份交错所导致的非正常状况造成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的出现，即人的虚拟身份与他本人的异化。与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不同，虚拟身份更像是由主体通过仿真所创造出的在另一个（虚拟）空间里的自我呈现形式，不管其真实性如何。

四、反异化的可能性和标准

凯尔纳综合分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给出了极富洞见的有关反异化（de-alienation）的解读。凯尔纳的贡献在于，他发扬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中不被许多人（特别是马克思）所重视的后一阶段过程，即“反异化”过程，并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对于身处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劳动者来说，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且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权；但另一方面，由于不断的技术革新给社会及个人带来的资本和知识的积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将逐渐被劳动者理解和看透，而这也必将带领他们走上反异化的道路。^[14]简单地说，对于凯尔纳而言，异化和反异化其实是同时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异化的开端实际上也是反异化的开端。而从异化理论的本质来看，凯尔纳的解读也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于马克思及其之后的学者而言，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们提出与异化有关理论的原初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劳动者（媒体概念中的受众）密切关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异化状况。而一旦他们的提醒被劳动者（或受众）接受和认可，使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异化的问题，并付诸行动，那么这些理论就转化成了一股可以削弱异化现象的力量。也就是说，提出异化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异化，异化理论本身就具有反异化倾向。

而福克斯和赛维尼亚尼对新媒体语境下“电子反异化”的可能性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们断言：只有当处在某个社会中的个体能有意识地减少其工作时间并将这些时间应用于人类工作（human work）的时候，才出现了电子反异化过程，而这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15]然而，他们的观点是武断的且他们的用词是模糊的，他们所谓的人类工作（human work）与非人类工作（unhuman work）的界限本身就难以明确定义。如果某个行为个体主动放弃某项报酬或利润更高的工作，转而将精力放在一些非盈利性质的公益行为上，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将这些行为与具有反异化特征的人类行为进行联系。费舍尔则认为社交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已经造成了反异化现象的出现。但与此同时他又谨慎地指出了一种因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使用者和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间所存在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而出现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言论的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识的独立和解放可以

被认为是“电子反异化”的一股强大势力；而另一方面，为了能维持并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信息资本主义体系似乎是在主动向新媒体寻求帮助。新媒体中包含的这些“电子反异化”因素对于社会的边缘群体、被统治群体，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来说具有巨大吸引力，他们渴望被聆听，而社交媒体为他们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由此，费舍尔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由社交媒体产生的反异化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是更强大更有效的剥削（exploitation）。^[16]

费舍尔的问题在于，他还是低估了实现“反异化”过程的标准。如果某行为仅具有言论自由、思想和意识的独立和解放这些元素而不具有其他元素，那么该行为至多只能算得上是“类反异化的（semi de-alienational）”行为或是通往真正反异化过程的中间行为，但它们与真正的反异化行为仍有明显的差异。显然，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工作中埋怨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高、工资过低甚至威胁罢工的工人看作是“反异化”的先锋群体。尽管他们的行为里也部分包含了某些言论的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识的解放等诸多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旦他们的某些诉求得到满足，他们的反抗行为就会停止。

综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凯尔纳对反异化的解析，我们可以认为，标准的反异化行为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行为主体的行动必须是主动的且有清晰自我认识的，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规则来进行、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具有正面价值的行为，且根本目的与资本的积累不相关联；有可能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影响他人的行动目标，进而使整个社会的结构或构成产生变化。简单地说，反异化行为包含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行为个体具有主动性，其次，行为方式是正向的且以自我实现为前提，第三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反观费舍尔论述中所试图包含的“反异化”群体：尽管他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从他们的思想、诉求以及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来看，他们的行为总的来说还是被动且盲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具有报复倾向的；他们的行为也不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而仅是对内心不满的抒发；尽管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也不至于对整个社会结构造成破坏性冲击。因此，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开始或已经发生意识觉醒的群体，而是属于被压抑太久的群体。

五、新媒体中的反异化行为

2013年，一位名叫 Vugar Huseynzade 的瑞典小伙被阿塞拜疆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FC Baku 聘用，成为球队新一任的主教练。当时，他年仅 21 岁，且没有任何与职业足球相关的背景；他唯一与足球有关的经历是，他是电子游戏“足球经理（football manager）”的资深玩家。据报道称，在应聘过程中他凭借着从足球经理游戏中学到的丰富的足球技战术和球队运营管理知识击败了法国传奇球星帕潘，最终得到了这个职位。^[17]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有必要对波德里亚的仿像理论进行重新的思考。事实上，Huseynzade 并没有被电子游戏中的仿真世界所蒙蔽，他在游戏中的虚拟身份也并没有与他本人产生分离，应该说，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的统一整体。尽管在空间上与他本人存在距离，他的虚拟身份更类似于他本人在另一维度的延伸。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通过游戏中的虚拟身份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作为支持，他根本不会有机会获得这份工作。Huseynzade 在新媒体中进行的（玩电子游戏）是主动的且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而借助新媒体这一平台，他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可以说他是主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制度的帮助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反过来。因此，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反异化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自我实现行为只是针对其本人，并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也不会对现存制度造成冲击。也就是说，对比标准的反异化行为，他的自我实现程度仍然是有限的，他的反异化行为还是狭隘的。

随着 web2.0 时代的到来,詹金斯关注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源自草根的“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18]在“参与文化”语境下,大众通过社交媒体产生联系。依托社交媒体,一些具有共同爱好的个人可以在线上及线下自由地进行互动联系。他们为喜爱的影视节目录制粉丝视频(fan video),为受欢迎的电子游戏制作非官方补丁(modding),根据原作撰写粉丝版本的小说(fan fiction writing)。原来大众媒体环境下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创用者(prosumer)概念或许在新媒体时代真的出现了。参与文化中的参与者的行为具有主动性,而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角色的不断互换似乎也说明了现存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转型。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行为并不具备明显的自我实现特征。加入到参与文化中的个体,他们的粉丝行为多数还是属于娱乐和玩票性质。而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模糊,并没有使社会出现结构性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仍然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由此可见,参与文化中的个体,尽管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反异化特征,但仍不能属于彻底的反异化行为。

在观察了新媒体时代的新闻行业后,吉尔默提出了“我们即媒介(we the media)”的概念。^[19]他注意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媒介融合降低了曾经高度职业化的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在新媒体时代,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媒体人。一旦我们捕捉到某条有价值的讯息并通过手机或其他工具在互联网上进行发布,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受到大量的关注。“我们即媒介”这一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将这一现象与前文所述的反异化行为所需条件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自媒体时代的草根“媒体人”,他们的行为是主动的且具有自我实现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提供新闻素材的目的只是因为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向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分享或呈现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而与物质因素完全无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挑战和威胁到了传统媒体的地位。传统媒体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并做出针对性调整以迎合时代的发展规律,类似于“文化工业”性质的文化产品在当今时代将变得很难生存。因此,“我们即媒介”行为是有理由被看成标准反异化行为的。

六、结 语

本文分别从“异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大众媒体与异化”以及“新媒体与异化”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异化理论的发展轨迹以及异化在不同媒体时代对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影响。纵观异化理论的发展史,我们所受到的异化不管是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看,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当今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已经被三种不同形式的异化所包围:(1)工业社会中发生在传统劳动身上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2)大众媒体时代中文化工业所产生的知识缺失性异化;(3)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电子劳动所产生的电子异化。异化强度的增加也使得不少学者对人类在新媒体时代觉醒的可能性抱有非乐观的态度。然而,结合凯尔纳对反异化的阐述以及新媒体时代出现的许多与异化具有相异甚至相反特征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反异化的强度似乎与异化的强度之间存在某种能动关系。异化的确正在影响我们,而我们也正在通过反异化行为予以回击。又或许,这些具有反异化特征的行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生物,更大强度的异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更大强度的反异化。通过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行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协作,异化的未来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断言异化会压倒反异化或反异化会战胜异化都是不明智的。但至少,历史的发展证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异化思想还是过于消极了。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当然也不能盲目乐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还是要相信人类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说,狄更斯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双城记》里的开篇名

言是：“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20]或许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描述，或许对每个时代都是。

参考文献：

- [1] [法] 让-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M]. 李常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1-150.
- [2] [法] 让-雅克·卢梭. 社会契约论 [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
- [3] [德] 格奥尔格·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79.
- [4] [德]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M]. 荣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66.
- [5] [德]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57.
- [6] [匈] 乔治·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 [7]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3.
- [8] [德]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5-14.
- [9]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6.
- [10] [西]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时代的崛起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2.
- [11] Christian Fuchs. *Class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Internet* [A]. T·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C]. London: Routledge. 2013: Ch. 13.
- [12] Mark Andrejevic. *Estranged Free Labor* [A]. T·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C]. London: Routledge. 2013: Ch. 9.
- [13] [法] 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 [M]. 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1-112.
- [14] Douglas Kellner. *New Technologies and Alienation: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A]. L·Langman. *The Evolution of Alienation: Trauma, Promise, and the Millennium* [C].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47-68.
- [15] Christian Fuchs, Gerhard Seignani. 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J]. *Triple C*, 2013 (11): 237-293.
- [16] Eran Fisher. How Less Alienation Creates More Exploitation? Audience Labour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J]. *Triple C*, 2012 (10): 171-182.
- [17] Dan Ripley. *Meet the Man Who Honed His Genius on the Football Manager Computer Game* [EB/OL]. Daily Mail, <http://www.dailymail.co.uk/sport/football/article-2340324/Football-Manager-Vugar-Huseynzade-got-FC-Baku-job.html>, 2013-06-12.
- [18] Henry Jenkins.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9] Dan Gillmor. *We the Media* [M].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06: XV.
- [20] [英]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 [M]. 石永礼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

[责任编辑：赵晓兰]